

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找准贯通新供给新消费的发力方向

李晓华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既是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变化的需要,也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提出明确要求,这些都是围绕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动态平衡作出的重要部署。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供需关系的突出矛盾是“供需错配”,主要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究其原因,既有居民对经济和收入增长预期偏弱的影响,又有供给质量和消费需求不匹配、供给结构还不能适应消费需求升级变化的因素。因此,扩内需、促消费,既要在需求侧发力,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完善社会保障、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也要在供给侧发力,将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解决供需错配问题作为重要的政策着力点,通过创造和提供符合消费升级方向的新产品、新服务,促进潜在消费需求充分释放。

新供给不足制约消费增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居民收入实现与经济增长同步。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居民消费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升级,从偏重价格的同质化消费向追求品质和体验的多元化、差异化消费转变。尽管我国物质产品的供给能力强、生产规模大,特别是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具有领先优势,但供给的总体结构和水平仍然滞后于消费需求升级的要求。

一是传统产业的产品创新能力不足。整体来看,传统产业的产品附加值低、利润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新产品开发人员数量少、研发投入规模小。这使得传统产业的产品差异化小,不少企业习惯于采用低价竞争的方式扩大销量、提高市场份额。不仅导致行业利润率下降,而且引发一些行业出现全面亏损,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和新产品开发力度。同时,在全球产业链分工条件下,传统产业中的一些出口企业不直接面向市场,按订单生产,出口产品在功能、规格、技术标准等方面与国内需求存在较大差异,企业也缺乏面向国内市场开发新产品的能力。这些都造成消费者对产品使用的更新换代动力不足,消费刺激政策的效果也出现衰减。

二是颠覆性技术的产业转化存在阻滞。新兴产业和未来发展由颠覆性技术创新驱动,能够为消费者带来具有全新功能的产品和新的消费体验,从而形成新产品购买浪潮。例如,扫地机器人在智能家居以及智能网联汽车都吸引了一批追求新体验的用户,形成了规模可观的市场需求。尽管我国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增长,产出了大量科技论文和发明专利,但创新链

和产业链融合的程度还不足,大量新技术未能有效转化为产品并投放市场。颠覆性技术转化形成的新产品在早期阶段往往开发成本高、功能不完善、稳定性和可靠性较低,因此在投放市场之初竞争力较弱,也缺乏应用场景。这导致企业难以获得持续收入用于产品迭代升级,难以向市场提供既创造新价值又具有更高性价比的产品。

三是服务业创新与消费升级的适配度还不高。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居民需求的重点是以制成品为主的实物产品,服务消费主要用于满足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同时,我国主要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制成品的国际分工,国家战略的重心也侧重于促进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无论是更好满足居民需求,还是更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都对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相比之下,服务业发展的滞后性凸显,主要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和高级化程度偏低、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撑不足,影响制造业的产品创新;生活性服务业同质化明显,在服务质量和供给丰富度上难以满足消费者日趋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

优化供给的主要着力点

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人口结构变化,特别是年轻一代消费者成长,人们的消费理念正在从单纯要求物美价廉转向兼具便捷、健康、绿色等偏好,消费结构也从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为主转向更多满足精神追求和个人发展的多元化、差异化需求。对此,供给体系需要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积极适配消费需求变化,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强化创新驱动作用。创新是提高供给质量、构建高质量供给体系的关键,既包括技术创新,又包括产业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品质、性能等方面显著改进的新产品;业态创新、模式创新则能通过重构价值链和客户服务体系,以全新方式满足消费需求。同时,科技创新特别是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的改进,还具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的作用,从而以更具有吸引力的价格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通过持续创造新产品、新价值,可以有效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释放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当前,应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机遇,促进颠覆性创新涌现并加快实现产业化,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正在成为重塑生产生活方式的关键力量。不仅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已经成为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和助手,人工智能与消费电子、汽车、家电、家居等消费品的融合,也极大地拓展和提升了消费品的功能。依托于人工智能自适应、



自决策等能力,智能产品能够提供“千人千面”的服务,有效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已成为新的消费趋势。不仅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意愿显著增强,而且电动化转型提升了产品使用的便利性、丰富了产品功能,使这些产品成为更多消费者的优先选择。对此,生产企业应加快绿色转型,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产品的生产全过程,使用全周期,不断丰富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积极打造绿色消费模式。

坚持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我国尚未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且经济发展存在着地区间、城乡间的不平衡,高质量商品的消费空间依然广阔。同时要看到,实物消费具有明显的边际效用递减特征,当拥有量达到一定水平后,需求增量便会趋于饱和。相对而言,服务业具有消费频次高、增长可持续性等特点,消费者在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后,对能够提供新价值特别是体验价值、情绪价值的服务需求进入快速增长期。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显著提升。此外,制造业和服务业存在深度互动,一方面,制造业正呈现服务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在研发、制造产品的基础上开展增值服务;另一方面,设计、科技服务以及互联网增值服务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提升制造业供给能力的关键支撑。

多维度强化支撑保障

新供给能够创造新需求,新消费能够引领新供给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科技革命的大潮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技术能够通过消费者的使用得到检验,由此带来的新供给也将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断扩大规模。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针对现存痛点,多维度强化贯通新供给和新消费的支持保障。

围绕消费升级加快产品创新。支持知名智库机构、市场调查机构发布国内消费市场趋势报告,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发挥在大数据领域的优势,精准分析行业消费特征,引导企业按需开发新产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新技术的突破及转化应用。同时,优化科技创新创业的软硬件条件,分区域和行业布局建设一批小试和中试平台,鼓励代工企业承接科技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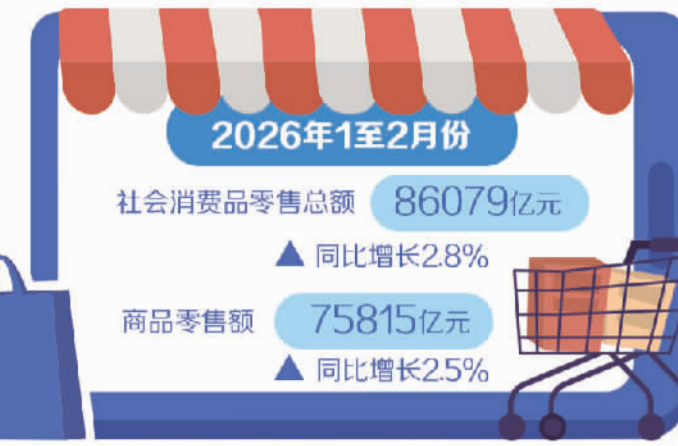
小企业订单。将智能化作为产品创新的重点方向,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鼓励工业APP和垂直领域智能体开发,切实降低中小企业的创新成本。

加强对新供给的场景支持和市场支持。在文化旅游、体育、娱乐、教育以及养老助残托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加快培育一批技术创新应用场景,重点推动服务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领域以及有利于虚拟现实、数字艺术等发展的智能化应用场景创新。坚持包容审慎原则,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探索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为颠覆性创新产品提供真实场景下的验证空间。加大对新技术应用的消费侧支持,针对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形成的新产品,可考虑在其市场投放早期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应用,并在新产品进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后依法合理对消费者进行直接补贴。通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大对智能化、绿色化耐用消费品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大对服务消费领域消费场景创新和发布的支持。

完善新供给和新消费的基础设施。围绕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和数字消费、绿色消费需求,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5G网络深度和广度覆盖,提高居民区、中心商务区、商业街区、运动和文体场馆、学校等人口密集区域的覆盖质量,积极推动矿山、工厂等5G专网建设。科学布局 and 适度超前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完善居民区、城市公共停车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的充电桩、换电站建设。在建设用能、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方面,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以扩大开放提升新供给、激发新消费。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深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试点范围,开展首创性、特色化、差异化探索。重点推进电信服务和相关数字服务、医疗健康、金融等专业服务的对外开放,在提供高质量服务消费供给的同时,促进先进技术和经验扩散应用,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倒逼国内企业提升供给质量。积极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支持外贸企业开拓跨境电商开发国内市场,培育自主品牌,使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质产品更好满足国内需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并将其作为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新认识和体会。这内在要求既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又着力开发人力资源,强调物的积累和人的发展相互赋能,体现出对投资理念、方向、重点的提升和优化。推动物质资本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形成有效支撑,是其中一个重要发力方向。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人的发展需要以物的发展为基础支撑,物的发展需要以人的发展为驱动力。从生产三要素的角度看,劳动者处在人的层面,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处在物的层面。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利用知识和技能,不仅能创造或改造劳动资料,也能改变或影响劳动对象。反之,劳动资料或劳动对象的升级换代也会推动劳动者在知识和技能上实现增长与转型,助力人的全面发展。例如,广泛采用先进设备、工具、仪器等劳动资料用于新材料、新能源等劳动对象,不仅有助于劳动者学习掌握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资源的本领,而且会增强劳动者创造先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意识和动力,提升劳动生产力。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型劳动资料与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对象,使劳动者在不损失生产和决策效率的同时,从重复性、机械性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中摆脱出来,可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文化、体育等活动中,实现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发展。从投资的角度看,如果把投资于人看作是资源投向劳动者能力水平的提高,那么投资于物对应的就是资源投向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水平的提高。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需进一步明确以投资于物为支撑实现投资于人的目的,从根本上确保生产力发展得到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

实现物的积累和人的发展相互赋能,对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应对当前供需矛盾的有效路径。投资作为中间需求,是协调供需关系的重要手段。把各类资金引导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上来,引导到各类民生领域的投资方向上来,既能提升供给效率和质量,又能激发需求潜力,促进供需实现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内在要求。加强先进生产设备投入、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以及一体化构建现代交通、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以投资于物驱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协同增效,既能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突破“卡脖子”技术,又可使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形成有效衔接,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新动能,增强发展韧性。

这是改变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状况的务实举措。以投资于物支撑投资于人,培养符合科技和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推动“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增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将有效提升创新效率、改进产品质量、提高企业效益,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打破传统的要素驱动模式的局限。改革开放后一个较长时期,为解决经济建设面临的物质资本存量不足问题,我国在物质层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经济发展进入连续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在这个时期,投资于物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不仅推动形成了雄厚的物质资本基础,而且在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环境深刻变化,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必须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这就意味着,投资要由过去侧重于规模上的扩大转向更加注重赋能人的发展。

统筹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在实践中已展现出效果。例如,在教育领域,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连续多年保持在4%以上,并在提升质量和优化结构过程中带动了大量校舍新建和改扩建、校园场地改造、先进教学设备与仪器更新等物质资本投资。又如,在科技和产业领域,政府和企业不断加大在实验室、科研设施、数字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对科技和产业人才的吸引、培养、激励。

继续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重在把握好“紧密结合”的关键点,使物质资本更好服务于人的发展。**一是围绕人才成长布局投资。**根据人口分布、人在教育各阶段的需求以及就业趋势等,合理布局学校、职业技能培训基地、社区服务中心等。在重大项目建设中,同步规划人才引育、技能培训和生活服务设施。加大力度建设智慧校园、智能医院、数字化职业技能培训平台等,为劳动者的学习和能力提升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条件。

二是重视养老服务领域投资。优化财政补贴,加大养老服务机构床位建设补助,进一步支持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和普惠养老服务项目建设。推进新建住宅小区与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养老服务设施与居住区协调发展。鼓励养老、康养机构聘请专业技术人才,加大数字技术等的应用,打造一批管理高效的智慧养老服务机构。

三是推进城市更新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城乡居民居住环境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重要结合点。可考虑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增发国债等支持地方开展城市更新项目,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也可通过债权投资、股权投资等方式为城市更新提供支持。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引领,明确土地用途、环境保护、公共设施等方面的要求,强化对规划实施的监督。有效使用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加大对农村道路、给排水、供电等硬件设施以及教育、医疗、文体等软件设施的投入力度。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

万劲波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基垒台、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就“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创新体系”作出重要部署。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深化科研院所改革,加强国家实验室和重大科技任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统筹部署”。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进一步明晰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定位和布局,在强化协同合作上下功夫,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加快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体系化创新能力。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代表国家水平的科技中坚力量,是一个国家在世界科技强国竞争中占据主动的关键。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科技竞争正从单一技术、机构竞争转向体系化创新能力和创新效能竞争,产业竞争正从单一产品、企业竞争转向产业链协同以及生态主导权竞争。在此背景下,一国的体系化创新能力成为支撑和引领未来科技和产业竞争的重中之重。这种能力既表现为科技资源投入、原始创新策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的整体能力,又表现为各创新主体和创新要素的结构优化、布局科学、组织有效,还表现为创新活动跨主体、跨要素、全链条的协同能力。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充分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加快建设,以此牵引带动各类科技力量协同,在新能源、信息通信、人工智能应用、先进制造和装备、量子信息等领域已形成先发优势。目前,我国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全球规模最大的科技人才队伍、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这些都为“十五五”时期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和创新效能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要看到,与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要求相比,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仍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风险依然存在,科技和产业创新的新动能新优势还不够强。科技力量的协同性、体系化不强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一方面,各主体的主责主业以及功能定位比较宽泛。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均强调使命驱动、任务导向,部分国家实验室和全国重点实验室、省实验室的职能重叠。例如,生物育种、集成电路、先进材料等领域部分实验室的主责主业不够聚焦,建制化、体系化优势不够突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均承担基础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职能,科教协同育人的能力有待加强。科技领军企业平均研发强度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仍有差距,关键核心技术体系化攻关能力和效能还不够高。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5年欧盟工业研发投入记分牌》,2024年,中国525家企业平均研发强度为4.0%,与美国674家企业8.4%的平均研发强度有较大差距。

另一方面,科研组织多主体协同、全链条衔接机制不畅。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技术开发、工程化和产业化,不同部门、机构和地方围绕重点领域部署了一系列重大科

技任务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各环节由不同创新主体领衔承担,存在链条长、环节多、协同难度大的情况。部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更加重视重大科技任务的争取以及成果产出的数量,原始创新和价值贡献的导向不够凸显,难以聚焦“制高点”和“基础前沿”持续深耕。一些国家战略科技任务的战略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向不突出,缺乏“适配”的专责承担主体,难以集聚优势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

实现“十五五”时期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的战略目标,必须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显著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一是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聚焦国家战略需求,进一步明确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责主业。体系化布局建设前瞻引领型、战略导向型、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重大科技创新领域建设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的国家实验室,支持国家实验室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深化科研机构改革,加快布局调整和优化重组,更好发挥科研机构建制化和体系化优势,使其成为攻坚克难、引领发展、抢占国际科技竞争制高点的主力先锋。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提升自主培养和吸引集聚高水平科技人才的能力,不断壮大国际顶尖科技人才队伍,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优化各类科技力量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带动各类科技力量协同。

二是完善战略任务和战略力量统筹部署实施相关机制。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建立战略性、前瞻性、系统性的创新需求凝练机制和任务生成机制,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考虑建立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选题评价机制,有组织、常态化地征集创新需求和选题建议,形成任务清单,及时立项,完善监管、评价激励和动态调整机制。优化战略科技任务协同组织实施机制,加强各类科技计划和任务的统筹衔接,推动项目、人才、资金、平台和基地统筹部署。具体来看,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以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为主,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以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为主,科技企业以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为主。强化技术科学连接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桥梁纽带作用。还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聚力锻长板、补短板、挖潜力,加强全链条部署、体系化布局。

三是构建多元化、长周期的科技资源统筹配置机制。把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把科研攻关、成果转化、市场应用有效衔接起来。结合各地区定位,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区域布局,统筹推进国际科创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引导地方支出更加重视支持长期性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3只区域基金的引领带动作用,吸引地方政府、央企国企、金融机构、民间资本参与,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增强保险和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功能,引导耐心资本支持协同创新。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